

20世纪 中国考古学史 研究论丛

陈星灿

文物出版社

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 研究论丛

陈星灿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谷艳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陈星灿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10 - 2679 - 1

I. 2… II. 陈… III. 石器时代考古 - 考古学史 - 中国 - 文集 IV. K871. 1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011 号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

陈星灿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15.5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679-1 定价: 75.00 元

前 言

这二十多篇文章，是我过去十年学习中国考古学史的一点心得。

2001年9月18日，“九一一”过后的第七天，我应时任瑞典东方博物馆馆长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博士的邀请，从美国波士顿飞越大西洋，到东方博物馆作短期学术访问。马思中博士邀请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协助他举办一个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大型展览，二是合作写一本与展览配套的馆藏中国史前文物的大型图录。基于这两个目的，到2004年9月4日“中国之前的中国”展览开幕之前，我又三次访问该馆，翻拍和阅读了馆藏安特生（J. G. Andersson）和高本汉（B. Karlgren）先生的通讯档案，观摩了安特生带回瑞典的中国史前文物，对东方博物馆和安特生等瑞典学者与20世纪前半中国考古学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展览比我们原来计划的规模要小；中英文对照的大型图录没有写成，最后只请东方博物馆的Eva Myrdal博士写成了瑞典文的同名图录（*Kina före Kina,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2004*）。展览完全依据安特生在中国考古的采集品展开。为了让读者了解这批采集品的来龙去脉，我和马思中博士赶在展览开幕之前，出版了《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与中国史前史的发现》一书（中英文双语版，斯德哥尔摩，2004），算是为观众了解这个展览尽了一点心力。尽管我过去写过一本《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自觉对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略有所知，但是为了写好图录并办好这次展览，还是很认真地阅读了东方博物馆的大量馆藏档案，特别是安特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前辈学者的通信，得到许多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本书收录的许多文章，比如有关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安特生、李济、胡适、丁文江、杨钟健、裴文中、高本汉、陈梦家等等的论述便是以东方博物馆馆藏档案为依据撰写的，它们也为撰写《中国之前的中国》做了准备和铺垫。必须说明，这些文章多是与马思中博士合写的，感谢他允许我把这些文章收入本

书。这本书是我们多年合作的美好见证，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中瑞考古学界在 21 世纪继续合作的象征。

本书其他文章，有的是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早期研究的讨论，有的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心路历程的分析，还有的是对中国远古文化某些关键问题的述评，多少都反映了我对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剩余的那些篇章，也多是根据档案（包括田野考察笔记、日记、通信等）撰写的。关于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故事、夏鼐和张光直交往的故事，均是根据张光直先生的夫人李卉师母惠示先生的手稿和通信写成；而有关夏鼐、尹达和安志敏的故事，则是根据安志敏先生保存下来的一封通信写成。和前述根据东方博物馆档案写成的文章一样，这些文章水平不高，收录在这里是为了保存史料，这也是我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

本书所收文章发表在海峡两岸的多种杂志和论文集中，查找不便。付永旭同学花费了很多心力搜集、校对它们，黄超同学帮助我核对了文献，是我首先要感谢的。感谢文物出版社，没有其大力支持，本书是无法跟读者见面的。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导师安志敏先生（1924—2005）的八十五岁冥诞。

目 录

前 言	(1)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	(1)
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	(16)
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	(30)
从一元到多元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	(69)
是谁最先认定中国有石器时代	(75)
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	(77)
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安特生致瑞典王太子的信及其释读	(87)
陈梦家致高本汉的两封信	(95)
跋新发现的杨钟健和安特生交往的一点史料	(100)
李济与安特生	
——从高本汉写给李济的三封信谈起	(109)
裴文中与安特生	
——跋新发现的裴安通信	(128)
胡适与安特生	
——兼谈胡适对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考古学的看法	(146)
《甘肃考古发现》与《甘肃考古记》	
——一个学术史的问题	(164)
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从学者到学者的回归	(177)
安特生先生半个世纪以前的一封信	
——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八十周年	(189)
安特生当年发掘的文物是如何运出中国的	(193)
张光直课堂笔记所见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片段	(201)

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 (205)

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纪念考古学家夏鼐、尹达和安志敏先生 (212)

旧闻新读

——考古人类学界的人和事 (220)

高本汉与广州中山大学

——跋一封新发现的中山大学致高本汉的邀请函 (228)

丁文江的古史观

——跋丁文江和安特生的两封通信 (232)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

一 引言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从概念和实质两方面来说，都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它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虽然公认已有千年的历史^①，但是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方法的传承，对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都影响甚微，不能做过高的估价^②。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时间，有种种不同的认识，比较主要的大致有：1921年说，是以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 Johan Gunnar, 1874-1960）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为标志的；1926年说，是以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为标志的；1921年以前说，是以西方和日本学者自19世纪末期起在中国的广泛调查为标志的^③。这些说法，都有其一定的道理。近代中国人文科学的主要奠基者和组织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1896-1950）在1930年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讲演里，明确指出：“首用新方法的人，为瑞典人安特生，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④算是最早明确肯定1921年说的权威意见，后来这种看法为考古界广泛接受^⑤。

但是，要讲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不应忘记在公认的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有一个为时不短的田野调查阶段，其间也包括少数的小规模的发掘。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前史。我把这一阶段，定为1895-1921年^⑥，主要的标志为下列几个：

（1）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自1895年夏末（《马关条约》签订之年）开始在辽东半岛进行的考古学田野调查。此后他又于1905、1908年两度进入辽东半岛调查，将上述三次考察结果，写成《南满洲调查报告》于1910年出版。此外，他还和其他日本学者一道，在20世纪初叶，数度考察蒙古草原地区，发现了赤峰红山后等史前遗址，提出了考古遗物的文

化属性问题并试图加以探讨。

(2) 田中正太郎等日本考古学者自 1896 年开始在台湾的田野考古活动,其中主要是调查,但也包括个别的发掘工作。据发掘台北冈山贝丘的鸟居龙藏统计,至 1910 年台湾已经发现的遗迹多达 169 处。

(3) 20 世纪初叶西方学者的田野考古活动。如斯坦因 (Stein, Aurel, 1862-1943)、斯文赫定 (Hedin, Sven Anders, 1865-1952) 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调查发现大量史前石器;劳佛尔 (Laufer, B.) 在西藏及华北地区采集为数不少的古代玉、石器,并据之撰成《玉器——中国的考古和宗教研究》一书;1914-1915 年爱德加 (Edgar, H.) 在四川岷江地区的考古调查;以及安特生及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同事对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采集和调查。

(4) 1921 年 6-7 月间安特生、步达生 (Black, Davidson, 1884-1934) 等对奉天锦西沙锅屯的发掘^⑦。

该阶段的工作,虽然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在有的地区还积累了不少的材料,但是,在方法上,多是零星的采集,少有系统的调查和发掘;资料的发表又多是外文且不系统,少有中国学者参与,对后来的研究影响不大。

综观 1921 年以后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以 1950 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也许是最合适的选择。结合田野和室内研究工作,本文拟把 1950 年以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分为以下三期。即:1921-1931 年为发生期;1931-1937 年是发展期;1937-1949 年是停滞期。下面围绕中国史前文化的起源问题分别论述之。

二 中国史前文化从哪里来——仰韶文化发现所引起的问题

(1921-1931)

中国古代文明好像一开始就如传说中的老子一样,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它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被人注意,但只是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才有了深入探讨的可能。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前,很多学者对发现的古代石器做过推测。鸟居龙藏分别蒙古高原和东北的石器为古代东胡和通古斯族的遗物,分别用“蒙古式”和“满洲式”名之,他认为两者皆非中国的东西,亦非汉族先民的遗物。美国学者劳佛尔也认为:“中国石器时亦见之,但甚鲜少。中国从未有石器存积一处,形色俱备,而能使吾人定论其人其时无金属

之助而专恃石器为生者。或石器工作发达完备足可供一地之需要者。故据现在所知者言之，不能谓有中国石器时代。更从中国典籍考之，尤无所谓中国人之石器时代也。”^⑧章鸿钊也指出：“往时中国境内，似亦非无用石器者，然与其谓为出于中国人之手，毋宁谓为出于异族人之手当也。而此异族人固尝生息长养于中国者，故仅谓中国之石器犹可，谓为今中国人之石器则不可也。”^⑨他认为汉族自古以来就是金属器的使用者。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早期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1921—1931年期间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期间及其后，又对河南中西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古代遗址做了范围较大的调查和试掘。他为什么要到西部去？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史前文化的来源问题。仰韶文化的发现，一方面他通过与华北地区已知汉族文化的比较，比如仰韶所出陶鬲和周代铜鬲及金文中“鬲”字的比较，肯定仰韶遗存是汉族的史前文化，也即“早期中国人之文化”，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另一方面，他又把彩陶和近东和欧洲所出彩陶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许多相似之点，“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器之术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进而认为“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⑩虽然安特生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承认仰韶文化西来只是一个假说，但他私心里是相信这假说的，所以他花费了两年的工夫去调查甘青地区，希望把仰韶和近东、中亚之间的空白填补起来。^⑪

甘青地区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安特生的假说。开始，他根据华北地区新石器晚期以前遗址的空缺，甘青地区精美彩陶的发现，更加信任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首先在新疆成长起来，并从西方受到了影响，其后来到甘青地区，并向东发展到黄河中下游。“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决仰韶问题之地。因吾人于此可以识别一种蒙古利亚民族（即黄色人种）当新石器时代，曾受西方文化之影响，亦或受西方人种之影响，生息繁衍，渐至务农。文明因而大进，是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之始。然此种文化确实之发源地，非于新疆详加研究，不能判定。”^⑫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说一出，即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主要的理由是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鬲之属以及援、戈等物，罕见于作为重要孔道的甘青地区；此外，甘肃所出彩陶与河南仰韶彩陶也不完全一致^⑬。基于这些批评，安

特生对上述假说做了修改：（一）他否认了整个中国史前文化都是在新疆起源的说法，承认以鬲为代表的文化发源于华北的晋陕豫交界地区；（二）肯定彩陶是近东起源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由新疆、甘肃导入河南，与原有文化发生了融合。尽管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随彩陶而来的是土耳其种或者短颅的南印度的日耳曼民族，但体质人类学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结论¹⁹，所以安特生说：“人种之迁移，则未敢过问”¹⁵。

因为信仰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在年代学上，安特生必然相信西方的比中国的早，甘肃的比河南的早，所以在他所拟定的仰韶文化六期说中，他把以河南出土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期放在第二期，认为它晚于以单色陶器为主的齐家期。其他如马厂、辛店、寺洼、沙井诸期，他也把它们放在殷商文化之前，认为代表了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没有认识到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虽然受到许多的怀疑，事实上，当时既不能证明甘肃的彩陶早于河南¹⁶，更没有在新疆发现可信的早期遗存，但是由于田野工作的局限性，人们还是广泛接受了这个假说¹⁷。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新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则试图根据古史提供的线索，在考古学上追溯夏商周各个民族文化的来源。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美国福利尔美术馆的第一次合作，选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虽然在发掘报告中他只是说“因为这种发现（指仰韶文化的发现——引者），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¹⁸；没有明说是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但把调查和发掘地点选在夏文化传说最盛行的晋南地区，不能不说有他特殊的历史方面的考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即紧紧抓住殷墟不放，目的在于从考古学上认识商文明，用李济的话说即是“挖掘出中国的历史”¹⁹。当时不少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华北地区最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和历史时期最早的遗址——安阳的商文明在时间上是紧接着的。因此，研究商文明自然也就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²⁰

安阳的发掘，使从考古学上审视历史时期的中国古代文明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成为可能，而1930年龙山文化的发现和1931年安阳后岗仰韶、龙山、商文化三叠层的发现，更使从考古学上追踪中国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²¹

三 二元对立——夷夏东西说在考古学上的投影 (1931 - 1937)

1929年的殷墟第三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的一个彩陶片。李济由此否定了假定中的仰韶文化与商文化属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文化的可能性，承认仰韶文化早于商文化。但他经过研究特别指出：“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者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与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辈份确差，年龄却甚难确定。”²⁸历史学家徐中舒则明确指出，“根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他是不赞成“虞夏商周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的，所以他又说“小屯文化既与仰韶文化分属两个系统，而且小屯有青铜器及甲骨文字等较仰韶遗物更加复杂，这样丰长的文化应当有所承受”。他相信殷墟200多年的历史中，不可能产生这样丰长的文化，而无疑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究竟从何处而来，徐中舒肯定指出“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他的最后结论是：“我以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²⁹

与这两篇根据考古发现而发表的论文几乎同时，傅斯年撰写了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完全从文献的角度，论证中国古代东西对峙的文化格局。他说：“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生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³⁰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认识背景，所以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因为它的内涵，昭示着在中国东部地区，确实存在着另一个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黑色而光亮的蛋壳陶以及白陶鬶等与殷墟出土物的相近，尤其是卜骨的存在更使人认识到小屯商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李济认为，殷商时代的骨卜习俗，“必具极长期之历史背景。这种历史的背景在那中国北部及西部分布极广的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毫无痕迹可寻，但在城子崖却找了出来。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原始在山东境内”。李济如此看重卜骨，乃是因为他相信在殷墟所代表的中国最早期的历史文化中，卜骨不仅是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而且骨卜的习惯，对于中国文字的早期演进大约有极大的推动力。李济总结说：“有了城子崖的发

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⑤

1931年的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为人们审视龙山文化的地位提供了绝好的视角。因为，城子崖发现之初，只知道这里有一个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文化，至于它和仰韶文化和小屯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则完全不清楚。虽然龙山黑陶层上有春秋战国间的遗址，依现在通行的年代计算，殷末到春秋初年约有400年，但是这正如梁思永所说，不能“作为龙山文化比小屯文化时代早的证据。而龙山和仰韶又同是石骨文化，所以我们也无从决定它们先后的次序”^⑥。所以，后岗三叠层的发现，的确是解开中国古代文化之谜的钥匙。

围绕三叠层的发现，不少学者展开了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的讨论。梁思永通过比较，发现后岗龙山文化层与仰韶村和不召寨出土的遗物，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安特生没有把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地层区分开的缘故，但是，梁思永根据其正确的类型学辨识，却得出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发生过密切关系的结论。这种密切关系，他认为有两种解释：其一，仰韶村本是彩陶文化的领土，被龙山文化侵入；其二，仰韶村本是龙山文化的领土，被彩陶文化侵入。他列举了四条理由支持他的第一种解释，尽管他也承认已有的证据还不能确定哪一种解释更合乎事实。这理由之一，就是在龙山文化没有到达仰韶之前，仰韶式的彩陶文化已经到达后岗；彩陶文化在黄河流域分布的中心偏西，伸展的方向由西向东是已成立的事实，它的势力先达仰韶村后到后岗是自然的程序。另一方面，也有相当的凭据证明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分布的中心偏东，伸展的方向是由东向西，它的势力先达后岗，然后才到仰韶村。第二，仰韶村出土的遗物包含着彩陶文化所有的陶器成分，而缺少龙山文化最精彩的部分。第三，除陶器外，其他遗物也有很大区别。第四，时代稍早于仰韶期的后岗彩陶层，没有龙山文化的器物，属于仰韶期的西阴村，也几乎没有龙山文化的遗物。他的最后结论是：仰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达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县高楼庄和渑池县仰韶村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河南北部。它先到后岗，占领了彩陶文化早期就废弃的遗址，后到仰韶村，遇到发达已过了最高点的彩陶文化。^⑦

梁思永对三叠层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关系的讨论，是在考古学上第一次提出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龙山文化自东向西发展，两者的中心分别位于黄

河流域的偏西和偏东部分，实际上即是说在中国东西部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二元对立的史前文化。不难看出，这是古史上的夷夏东西说在考古学上的投影。在这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导致了地层混乱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个认识的获得，是在刘耀（尹达，1906—1983）完成那篇著名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②之后。

二元对立的学说，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中国史前文化的来源问题——实际上也完全没有回答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更没有解决仰韶文化是否西来的疑问，但是，把龙山文化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紧密的一个源泉，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个否定。二元对立的假说，因为有古史的背景，在很长时间内左右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方向。主要的问题，除了观念上的原因，仍旧由于发现上的局限性。要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西部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确切地层关系，要不是东部沿海地区发现一系列早于龙山而又不同于中原仰韶文化的遗址，仰韶和龙山东西二元对立的假说还要继续存留下来。^③

四 年代学的突破——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1937—1949)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正在蓬勃开展的考古学田野工作陷于停滞。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及以后几年发表的一些著作，在文化因素的识别上，有了很大进步，并因而为已经发现的史前文化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193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者吴金鼎博士（1901—1948），在英国出版了《中国史前陶器》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专著。通过细密的分析，在肯定安特生关于仰韶村的遗存代表一个文化的基础上，他认为这个文化经历了很长的过程。他提出整个遗址的遗存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文化期。而不召寨遗址属于仰韶二期，即晚期。不仅如此，在他的结论里，他还特别指出，不召寨不能划入仰韶文化中，因为它的陶器类型与仰韶村的判然有别，没有什么可以把它连接起来。虽然在年代上他把不召寨划入仰韶二期，但并不认为两者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他根据文化因素的识别，从类型、制法等方面，已经把不召寨纳入龙山文化的系统。这比前述梁思永的漫然把以仰韶村为代表的遗迹称为混合文化的做法，有了很大进步。为什么吴金鼎不直接把仰韶村所谓仰韶二期的东西，直接如不召寨一样，称其为龙

山文化，恐怕也是不愿相信安特生把地层弄混乱了。^③

刘燿的做法更进一步。他首先总结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并归纳出各自的文化特征，其次根据这些特征把不召寨从所谓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最后根据仰韶村出土遗物中有与不召寨相类同者，再把仰韶村的龙山文化遗存分离出来。他的结论是：“从陶器的各方面分析，确知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其本质各有不同，其时代或有先后。”^④至于两种文化的关系，他认识到“正和河南北部和河南广武所见的相同”，也就是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两个前后堆积的文化。这当然不能否定东西二元对立的学说，不过似乎刘燿对此发生了怀疑，因为既然豫北和豫西的广大地区都是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在上，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就应该仔细考虑了。尽管依旧没有脱离二元对立的窠臼，但基本上否定了仰韶村的遗存是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⑤。由此而来的唯一解释，是安特生的发掘把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弄混乱了。

安特生 1937 年到中国参观了城子崖龙山文化的遗物，并仔细检查了他在仰韶村和不召寨的发现。他认识到仰韶村和不召寨的许多陶器与城子崖下层的出土物相类似，也认识到不召寨的器物除了没有彩陶之外和仰韶村所出陶器几乎完全一致；不召寨的陶器和石器与小屯商文化的近似关系，使他改变了不召寨稍早的观点，第一次承认不召寨稍晚于仰韶村。但是由于他相信仰韶村上下各层均出土红、黑、灰三种陶器，并没有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中划分出来，实际上仍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文化单位。即便是不召寨，他也还是把它看成仰韶文化的一部分。问题的实质，是他不认为自己的发掘有问题。尽管如此，安特生通过准确的类型学的比较，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他说：“我们在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陶鬶、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⑥这恐怕是最早对东西二元对立发生怀疑并明确表述龙山文化可能与仰韶文化存在继承关系的意见。此后的 1953 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关野雄，根据差不多同样的材料，明确指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乃是此伏彼继的两个文化而不是分布不同的同时文化”^⑦，算是更准确的表述了。

与此同时，中外考古学家通过类型学的分析特别是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基本廓清了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关系，安特生早年建立的甘肃仰韶文化六期说，也基本上被否定了。这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否定，也是对文化多元性和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最初、最重要的认识。

主要的工作都是通过类型的比较完成的。比如国外的考古学家孟欣 (Mengcin, O.) 通过把齐家和不召寨的陶器和欧亚北区晚期新石器时代陶器对比, 认为以前者为代表的文化不会比公元前 2000 年早多少。巴霍芬 (Bachhofer, L.) 从齐家的安佛拉罐出发, 认为齐家和辛店是一回事。吴金鼎则完全通过类型和制作技术的比较, 把齐家看成是与龙山同时的文化。尹达更肯定地指出: “齐家期是否与仰韶文化同一系统, 正是一尚待详加研究的问题; 我们不能将它混入仰韶文化系统之中, 更不应于简单且机械的比较之后, 即以为是早于仰韶期的遗存。——因此, 我们在论及仰韶文化时应将齐家坪遗址除去。”^⑤ 裴文中还把齐家陶器与辛店、寺洼等期相比较, 意识到前者与后者的年代相当, 独立于仰韶文化系统之外。他还认为齐家坪的主人似为另一个民族, 代表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 即齐家文化。^⑥

从地层学上寻找问题的也不少。徐旭生 (1888 - 1976) 提出: “齐家坪的遗址同仰韶期的遗址散见各处, 并无地层上下的关系, 不过因为陶器的间接作用, 至于直接的证据却是没有。”^⑦ 类似的意见, 刘耀、裴文中、齐家坪报告的撰写者比林阿尔提 (Bylin-Althin) 都有。比氏还特别指出, 经过检查发掘记录, 原来安特生声称的没经扰乱过的齐家文化层中没有发现仰韶陶片, 陶片是在地面采集的说法, 并不可靠。他在记录里发现有明确在地面下 1.5 米处出土的陶片, 因而认为齐家文化的地层可能是经过扰乱的。

如果说这些都还是从文献上怀疑安特生的说法靠不住的话, 那么夏鼐在阳洼湾的发掘, 真正揭开了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相对年代的秘密。他在第 2 号墓的填土中, 发现了两片半山类型的彩陶片。他认为, 彩陶的制造者, 或者是另外一个较早的民族, 或者是齐家文化的人民, 不过在这墓葬以前较早的某一时期中制造的这些彩陶。但是通过比较, 他推断 “若不是较古的仰韶文化的遗物, 便是临近残存的仰韶文化区的输入品。总之从陶器方面来研究, 齐家陶和仰韶陶是属于两个系统, 我们不能说齐家陶是由仰韶陶演化而来的”^⑧。不仅否定了齐家期的领先地位, 还毫不迟疑地把它划入另外一个文化系统里。应该说, 至此, 虽然明确的仰韶文化与齐家等文化的地层学证据还要等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有结果, 但是通过夏鼐的发掘和其他学者的类型学分析, 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脉络已经初见端绪, 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否定。安特生本人, 也基本放弃了这个观点^⑨。当然, 要究明仰韶文化的来源, 也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事情了。^⑩

五 简短的结语

在这样一篇简略的文字里，是不可能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研究的历史进行细致分析的。我们只能就大的问题的讨论作非常粗疏的评述。这个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它还仍旧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主要课题。

总的看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不低，在社会动乱、战争频仍、专业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做出了很大成绩。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考古工作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范围从台湾、香港到青海、新疆、黑龙江和整个黄河流域，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虽然零星、缺乏系统，还不能说奠定了后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但是至少在地理的范围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可以说初步揭示出中国史前文化的丰富内涵。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才进入这一领域。在格局上，广大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少有涉及，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诞生时期的一个特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一格局没有变化，对在考古学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七·七事变”发生前的20世纪3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代表的第一代考古学家成长起来，地方性的考古组织如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等也开始田野考古工作，相应的，西方学者的考古活动大为减少，日本学者则独占了东北和台湾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虽然田野工作仍旧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就这一地区的本身来说，工作的力度显然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发现，开始扭转前一个时期地区研究的严重倾斜，但是这个工作刚开个头，就被日本人的侵略毁灭了。其后一直到1949年，由于战争的原因，仅有的几十位专业人员，或伤病死亡，或抛弃专业，残存的也经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队伍建设上使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遭受重创。该阶段的主要田野活动，集中在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规模有限；原来开展工作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则陷于停顿。

由于田野工作有限，又加传统古史观念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化起源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关注，除了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差不多所有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都是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参照系，并试图纳入这两个文化的范畴。^④比如，良渚文化一直是作为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区